

三味书屋

小视角还原大时代

——读郁伟年《朝歌晚唱》

南志刚

郁伟年先生的《朝歌晚唱》“意图折射出当时农民在压抑的政治环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选择“朝歌”来“晚唱”，体现了书写者对生命历程的“返观”，在钩沉记忆和故事的过程中，进行心灵和生命的“自我补偿”，用小视角还原大时代。

《朝歌晚唱》突出的特点就是



上下五千年 跃然于纸间

——《纸上的故宫》读后有感

车厘子

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正在央视热播，我也忍不住再次翻阅祝勇的新书《纸上的故宫》。书是上个月我在苏州诚品书店买的，厚厚的一册，硬壳精装本，标价36元，这个价格在如今精装书动辄半百起价的行情下简直就是良心价。而且装帧相当考究，封面是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局部人物像，腰封则用磨砂塑料制成，很有质感。祝勇并非老作家，却已是著作等身，迄今出版作品逾500万字，且至少一半的主题紧紧围绕故宫——他目前的工作单位所在地。

曾获“朱自清散文奖”的祝勇成名很早，但直到《纸上的故宫》，我才算真正读完一本他的书。以前只零星看过他个别的篇章。不是文章欠佳，而是因为我有“怕”他的文字，只好敬而远之。怕啥呢？他基本上只写中国古代的人物事，我“怕”的是他写的

我在这头 你在那头

——送别余光中先生

方其军

清癯俊朗的脸庞，苍白如雪的头发，玉树临风的身姿，语音似莲的谈吐……余光中先生满足了一般人对于诗人的全部想象。然而，这样的面容笑貌，在2017年12月14日凝成一幅恒久的风景，就像一朵傲雪的秋花，终究在冬日的寒风里戛然而落，停泊于苍茫大地。这一天，余光中先生走了。然而，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诗人仍会在我们的心里不断“复活”，以他留在世间的诗歌，以他寄在山河的情怀。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许多人对于余光中先生的印象，起源于收入初中课本的这首《乡愁》。所以，在余光中先生那里，不少人会自觉定位为初中生。余先生写诗60多年，写诗1000多首，而最脍炙人口的，恐怕就是这一首《乡愁》吧。有的好诗，是“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有的好诗，则是斗酒百篇、七步成诗。听说这首《乡愁》，余先生仅用20分钟写成，显然，那是心底情绪的荡漾，那是血脉灵感的迸发。

对于余光中的诗歌，我最感兴趣的意象是“蟋蟀”。蟋蟀的寂寂鸣叫，传达着清秋的乡土气息。他

“小”，视角小、故事小、空间小。全书以“记”为名，随类而辑，基本以“我”为视角展开叙述，所记皆为小事，空间集中于乡村。小视角的个人化叙事，将历史事件、人物、时代氛围叙述得鲜活生动；古朴自然的风貌，安宁和谐的氛围，浅俗满还的邻里关系，循环生态的生产方式。“稼穡记劳”真实再现生产队的劳动场景，既有生活之艰辛，也有劳动之快乐；“四季记趣”以儿童视角叙述乡村生活，有天真烂漫之趣；“时代记历”以亲历亲见的“忆苦饭”“破四旧”等，直抵历史的“硬伤”；“旧物记情”以“物”为载体，在温情的叙述中透出些许的伤感；“民俗纪实”记录了20世纪中后期浙东“上坟”“端午节”“做年糕”“探亲”“嫁娶”等风俗。《朝歌晚唱》有人、有事、有物、有景，构成一幅浙东乡村全景动态图。

《朝歌晚唱》以小见大，用一个个真实的小故事，见证特定时代，还原农村生产、生活的细节，在今昔对比中反思历史教训。《交公粮》反思道：“繁重的征购任务束缚了农民的手脚，成为农业生产的实际指挥棒。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农业生产结构十分单一，就是以粮为纲。”不打破僵化的经济模式，

不承认、不尊重农民的“私”，就不可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尽管作者赞叹“农民宁可自己勒紧腰带也要完成国家任务的精神”，但勤劳勇敢的农民长期“勒紧腰带”，总不是光彩的事，“仓廩实而知礼节”，长期贫困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梦》记述了农村男女青年“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愿望”，女孩向往成为列车员、环卫工人，男孩想当兵，甚至希望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特殊时代，由于户籍管理、社会分工而导致的城乡差别，对农村青年男女生存选择、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破四旧”中，古籍、字画、古董被没收了，精美的砖雕、木雕被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积淀遭受了空前破坏”，在反思中带有忏悔和自省。

《朝歌晚唱》深情地回忆乡土伦理中的浓浓亲情，深度挖掘特殊时代乡村生活中的人性美，集中展示纯真质朴的生活乐趣。《宣传队》里农民自发组织了文艺团体，自己做乐器，自己排练歌曲、样板戏、三句半，在农闲的时候演出，用风趣幽默的方式，给处于“文化沙漠”状态下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泉，滋润农民枯燥乏味的生活。《桥头》里的桥头，是“不可多得

的社会学堂”，孩子们在这里忘情地听故事、听历史，桥头成为转述乡村知识的场所。作为时代的产物，赤脚医生虽然医术有限，却能近距离地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土郎中”更是作为中华民间医术的传承人，走村串户，悬壶济世。《批斗会》里，“农民对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尊重的，不叫他们干重活，有学校的就叫他们做老师，或者做个记工员什么的”，淳朴的乡村伦理在夹缝中显现，对读书人的敬意和惠顾，给人一丝情感上的慰藉。从“四季记趣”中，我们可以集中感受到乡村少年“捉泥鳅”“拾田螺”“放鸽子”时的单纯快乐，也不难从《拾舍》《看电影》《小电影》等篇目中，体会属于那个时代的兴奋情绪。

《朝歌晚唱》的叙述语言朴实无华、干净纯洁，与淳朴自然的乡土生活相得益彰，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叙述节奏平稳祥和，不疾不徐，一个个细节娓娓道来，如细雨无声，显示出作者的雍容气度和平和心态。点缀于书页间的几幅插画，采用写实手法，不仅具象地传达了文字的意蕴，更有效地延展了作者的意趣。

（作者系宁波大学教授、宁波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象的景观，遥远的历史，也变得可亲可感。

《可以看见的宋代》一文标题听着很大，一开篇却瞬间拉近了我的心理距离，因为首句就点出“上林湖”，那是故乡慈溪最负盛名的湖泊，我的久游之地。这才知道，原来祝勇曾光顾慈溪并在某个下午待在上林湖边怀古。上林湖的出名是因为其中的越窑青瓷遗址，按照作者文中的说法，始于战国，终于两宋。历史的巧合在于，上林湖出土的秘色瓷今年还专程运到故宫展出，想必祝勇是与上林湖越窑青瓷有了“又一次亲密接触”，这确乎是“可以看见的宋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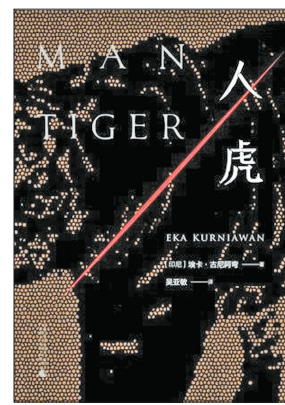
“含量”其实不高。全书分为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三辑，第一辑“纸上的故宫”，书名即缘于此，仅收入四篇文章，分别写王羲之、李白、苏轼和他们传世的书法名作以及南宋画家马和之的《诗经图》，这些书画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所以称作“纸上的故宫”；第二辑“婺源笔记”篇幅最长，记录对全国各地文化重镇的考察与思索；第三辑“消逝的匈奴”，除写古代匈奴的史实外，主要是关于日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影响。

如果从祝勇供职的故宫博物院的单位性质来看，他的身份首先应是文保工作者而非职业作家，他所从事的这门学问，就属于前院长郑欣淼先生提出的“故宫学”概念。然而，研究故宫学并不意味着只能待在宫内，博物院的藏品来自历朝历代、五湖四海，探寻它们蕴含的丰富价值当然要走向广阔天地，尤其是回到原产地，所以我认为《纸上的故宫》中最好的文章在第二辑里。抽象的文化，化作了具

《人虎》

荐书

《人虎》



印度尼西亚作家埃卡·古尼阿弯的小说《人虎》以当地古老的神话为基础，讲述了印尼一个村庄的青年马吉欧心中猛虎杀人的故事。

马吉欧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普通青年，体内有一头从他敬爱的爷爷那里继承的超自然的白色雌虎，白虎在某一天突然出现，杀死了邻居萨亚特。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作者对内容进行了巧妙布局，虽然时间不断转换，但情节环环相扣，没有任何的突兀或者不协调。

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人化虎的情节，往往是在危急关头或者情绪失控的情况下，人通过变成虎，化解危机，发泄情绪。其实《人虎》表达的也是类似的观

（推荐书友：金永淼）

作者	(印)埃卡·古尼阿弯
译者	吴亚敏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0月

点：雌虎之所以失控现身杀人，关键在于萨亚特触犯了马吉欧的底线。暴戾冷酷的父亲死亡，隐忍可怜的母亲被骗，情窦初开恋情的自我了断，这些事情一步步激发了马吉欧强烈的自尊心和巨大的羞耻心之间的矛盾，他无力也无意控制心中的雌虎，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当时的印尼社会，女人一般被认为是男人的奴隶、生孩子的工具，《人虎》将这一社会现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即使马吉欧的母亲不满意父亲，还是得和他结婚，并接受他婚后的虐待。萨亚特虽然没有妻子富有，甚至没有工作，但他可以随意挑逗、玩弄周围的女性。马吉欧的悲剧，其实就是社会的悲剧，马吉欧对母亲的维护，是作者对女性主义的宣扬，昭示着社会的进步。《人虎》也让埃卡·古尼阿弯成为印度尼西亚首位入围布克国际奖的作家。

（推荐书友：金永淼）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



《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勾勒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脉络：自北宋产生之后，经过南宋、元代、明代的延续，从苏轼对士人阶层的推崇，最后在董其昌的南宗北宗论中得到新的回响，从而印证了文人文化如何有效成为中国绘画及其理论的基石。

作者认为，如果把中国绘画看作一个整体，就会清楚看到从宋代末期开始，它的典型形式就受到文人艺术家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具有道德象征意义的主题、绘画品味偏好水墨或清淡着色，以及在画上填写诗文。后来就有一些反对文人传统的画家，他们的绘画实践也大体在这些框架里进行。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类特殊的艺术家，他们集政治家、作家、书

作者	(美)卜寿珊
译者	皮佳佳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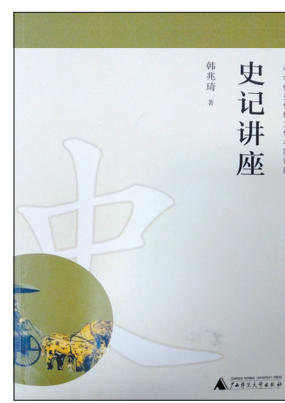
法家和画家于一身。作为饱学的精英，他们是决定中国艺术形式的人，他们的理念也成为后世创作者的基本出发点。

在苏轼看来，绘画和诗歌的标准是“天賦性”，其最高标准就是“自然”，因此，追求率性自然也就成了初期文人山水的一个明显特点。

作者指出，少数精英的绘画风格，最终塑造了所有的绘画形态，这是中国所独有的。典型的文人花卉树石画法在南宋形成，某些花草树木被赋予文化意义，其中梅、兰、竹、菊成为文人绘画的固有题材。而文人的个性也早已寓意在画作之中，如竹象征高士的品格，意味着历经艰难险阻和岁月侵袭，依然坚韧挺立。苏轼在题跋中就表明，他在画中看到的是他朋友的高贵品格。而南宋诗人受到梅花绽放的启发，沉醉于梅花落蕊的舞姿，逐渐形成了对梅的崇拜。

（推荐书友：虞时中）

《史记讲座》



《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欲读历史，必绕不开《史记》。

《史记讲座》由“司马迁其人”“《史记》其书”和“名篇解读”三部分构成。韩兆琦教授通过几十年的研究，采用新材料、新视角带给读者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司马迁。作者不仅描述了司马迁的生平，还述了他为李陵说话的原因，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和影响，还系统地分析了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矛盾。

韩兆琦教授说，《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史记讲座》不仅陈述了《史记》的基本常识，还揭示了它的悲剧内涵。作者细致地概括了悲剧人物的类型，探究其悲剧的原因，归纳《史记》悲剧的风格特征，让我们亲身体会英雄人物的悲剧色彩。除此之外，他以娓娓道来的方式阐述了《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古代传记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以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为例，后代许多长篇小说的主题，如忠奸之争、歌颂侠义、宫闱秘史和才子佳人，在《史记》中已见端倪。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史记》中的名篇进行了文本细读，包括《陈涉世家》《项羽本纪》《留侯世家》《淮阴王侯列传》《游侠列传》《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李斯列传》和《高祖本纪》。借助韩教授的解读，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变得平易近人，读来酣畅淋漓，回味无穷。尤其是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分析，紧扣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老到、精炼、准确，令人信服。

史学大师钱穆有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历史应该有所知。”读史使人明智，这就是吸引我翻开《史记讲座》的原因。

（推荐书友：万丽君）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区成长又流落异乡的诗人，那种痛，十指连心。他写下一首《大哉母爱》，副题是“给四川地震大难不死的孤儿”。如果要附着寓意，这个“孤儿”的内涵可以无限扩大。“天塌下来有妈妈/用脊椎来顶住”，这首诗，写得直白，但，有泪，有血，有呜咽。诗人的生命，是与四川维系着历史脐带的，是与大陆焊接着精神链条的。

在我刚刚读到《乡愁》的时候，就称余光中先生是老诗人了。在读到更多诗作的时候，我反而只认他是诗人，而将“老”字抹掉了。潜意识里，认他是常青树，不会老。然而，2016年他在诗集《守夜人》第三版自序中称：“再过12年我就100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第三版该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守夜人》了。”通透、豁达，看淡荣辱、任凭风吹。于是，《守夜人》就有了文化“遗嘱”的意味。哦，文化的“遗嘱”，他在1966年就已写了：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餐餐地图，从西湖到大湖到多鹤的重庆，代替回乡——（余光中《当我死时》）

哟，吓人啊这么高”，透着戏谑成分。余光中中的有些诗作同样亦庄亦谐，比如《五陵少年》，三段的末句分别是“喂！再来杯高粱”“听见没有？来一瓶高粱”“来一瓶高粱哪，店小二”，那种醉意，那种率真，跃然纸上。

当然，作为游历多国、博采众长的诗人，余光中对于西方文学元素的吸纳不可避免。诗作《江湖上》分为四段，每一段的结尾都是“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明眼人一看就知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诗人狄伦的调子。

余光中先生后来多次到访大陆，我周围多位朋友听过他的讲课。2011年，他受浙江大学的邀请来到杭州，写就散文《西湖怀古》，那是他写过的西湖，那是他魂牵梦萦的西湖。文中，他说：“我去杭州，另有一个动机，就是成全吾妻我存的寻根之旅。”因为，他未曾谋面、于1939年因肺疾歿的岳父曾任教于浙江大学。面对西湖，他说：“一道堤上有多少故事，一声橹里有多少兴亡，真令我不胜艳羡。”

余光中先生一辈子笔耕不辍，每有触动，付诸诗笔。2008年，80岁高龄之际，汶川地震使他的心海掀起浪涛。作为一个在川渝地